

NATIONAL  
GEOGRAPHIC  
华夏地理杂志

细节中国 系列丛书

艾绍强 编



# 当戏楼已成往事

近20多年来中国的城市化飞速发展，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  
但是，我们居住的城市到底有哪些历史故事和文化特征呢？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细节中国  
系列丛书



# 当戏楼已成往事

艾绍强 编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2011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戏楼已成往事/艾绍强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细节中国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100 - 07500 - 8

I. ①当… II. ①艾…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23643号

## 当戏楼已成往事

艾绍强 编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7500 - 8

---

2011年4月第1版 开本 720×1020 1/16  
201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8  
定价：49.00元

# 序

真实的历史是由点点滴滴细碎的事和物构成的。记得马未都先生在讲解鉴别古董时曾表述过，每一件真品的每个细节能比流传下来的历史书籍更为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生产能力及工艺水平，这才是古董的真正价值。

中国飞速发展的车轮掀起的喧嚣的尘埃正渐渐落下，匆忙的我们一段急行后也开始不觉地放慢了脚步。当我们能以较为平静的心情环视眼前那些曾被我们用心改造过的土地、山川、城市和人群时，也许会忽然发现，一段新的历史已被我们书写。而当我们发现我们书写的历史原来依旧是我们的祖先创造的五千年文明史的延续时，又是何等的惊喜。

如果，当我们通过对事实的观察再次断定，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是无法被割断时，我们就可以更加自信地相信，一个新的“文明复兴”将会又一次悄然惠顾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

《华夏地理》的这套“细节中国”系列丛书，恰恰是通过对各类事物的细节进行多视角的观察和描述，多方面地来刻画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和发现其历史的延续性。似乎，也在不觉中记录下了我们正书写的这段历史；或者说，记录了我们中华

民族在历史长河中走向再次“复兴”时留下的一段印记。

《当戏楼已成往事》讲的是关于城市的故事。近二十多年来的城市化飞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看起来好像丢失了不少，但城市毕竟是充满创造力的，所以《华夏地理》在寻访老城市文化特征的同时，也描述了新城市的梦想与现实、创造与活力；在关注都市世俗生活的同时，也关注它的未来走向……

民族志式报道少数民族，是《华夏地理》的传统，《游牧世界最高处》讲的正是少数民族的故事。当然，这本书里的故事并不是为了猎奇。报道者在讲述他人的生活时，更多地关注他们与我们的共同命运，里面涉及的问题，关乎他人，也关乎我们自己。

《谁家的夜郎》这本书，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某些王朝进行了片段解读，通过对历史遗迹的寻访，探寻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说的虽然是历史，但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从一些历史的细节我们或许可以发现许多今天问题的所在。

《华夏地理》一直不忘自己的媒体责任与忧患意识，时时在关注着许多现实问题。《生命怒放在神秘之境》就是报道与思考了诸多现实问题的一本书。冬虫夏草毁灭前的疯狂、贵州的石漠化困扰、中国的丝绸还是世界最好吗这样的问题，以及盗墓、布达拉宫的维修、从黄金部队到地下金矿这样的故事，既神秘而又引人注目，报道者通过自己的探访，把我们带到了神秘境地。

也许有人会问，“细节中国丛书”是否能全面地展示我们的现世今生呢？不，当然不能。然而，通过这斑驳点点的印记，也许能勾起你一段对往日的回忆，或引发你片刻的沉思；也许，还有你一声猛醒的惊叹。

喧嚣后的沉思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吗？

而今天的历史，还是让后人去评说吧！

《华夏地理》助理出版人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苏黎明".

## 目录 Contents

寻访北京“原住民”	001
当戏楼已成往事	023
北京，流浪者的梦想	049
所谓海派	065
上海创造，苏州河畔 SOHO 梦	085
广州大排档 自由精神的挽救	099
泡在中药里的广州人	117
市井成都	127
由麻将进入成都	137
在成都梦游	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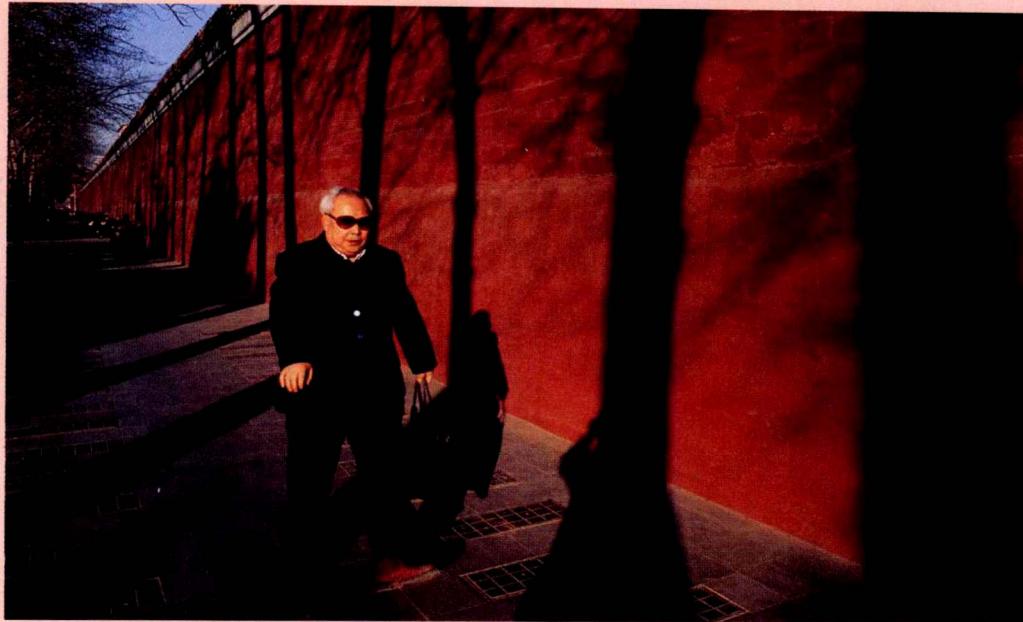
闲情苏州	171
留住老苏州的魂魄	187
福州三坊七巷的灵与肉	197
交通看武汉	207
铁路驮起的二连浩特	221
物语长安	227
刺桐——泉州的前生	245
沈阳，除了工业还有什么？	253
三亚变形记	269

## 寻访北京“原住民”

很久以来，在我每天出门见到邻居的时候，大家似乎都有着一种默契，彼此的眉眼中传露出一种“自己人”的目光。与同住在一个小区里来自外地的租房者不同，因为我已经被认同是北京人。我想似乎我也应该责无旁贷，接受这一种地域观念带来的情感交互。但又想到，我比现在年轻20岁的时候，初入京城，在北京人的眼光中彷徨迷惑的时光，心里总是无法释然。到底谁是真正的北京人？近年来传媒中无处不见的“北京人”、“上海人”、“东北人”、“河南人”……之间的争执只让我知道，一些人以自己是“北京原住民”为荣，而另一些人则对“北京土著”嗤之以鼻。但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应该去寻找更加本原的东西。历史也许会告诉我们谁是北京的“原住民”。

### “一根筋”的北京人

在蒲黄榆的“老五爆肚”店，我遇见了三个老北京。我看他们是老北京完全出于寻常的判断，用一口北京腔纵论天下，间或带出一些犄角旮旯的只有北京人才知道的人和事儿，彼此兄弟



北京人行进在象征皇权的红墙下，但在他们的眼里，任何权威都显得无足轻重。

相称，悠闲而且客气。满脑子是“原住民”的我本能地瞄上了他们。几句搭讪，排除了我要与他们谈“投资”的可能性以后，陌生和戒心一起消解了。李子河看着和气，李志强是一副什么都不吝的样子，大胡子王凤春看上去则很有几分豪气。

“要聊这个可就远了去了。”李子河想想说：“我给你出一主意，上什刹海，就那些提笼架鸟的老爷子，跟他们聊。跟我们聊吧，也就说点儿皮毛。”三个人里，李子河的祖籍是山东招远，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来到北京；李志强祖籍是天津的，也是父辈才来北京，都是“旧社会学徒的，给人受苦受累”。李志强的见解是：“真正祖籍在北京的人还真不多，两三辈儿是北京人就不错了。要说老北京，还得是旗人。”王凤春显然也认为自己是当然的老北京，但说起家世，还是不免有点含糊：“在北京至少有五六辈儿了吧，老家在广渠门那块儿，祖籍在哪儿说不太清楚。”

虽然他们没有给我更多有价值的讯息，但第二天，大胡子王凤春就帮我约了一位正黄旗的后裔赵永泉。在北京公交驾校工作的老赵 50 多岁，身体壮实。他平伸出左臂，握紧拳头，展示自

己的一根直筋：“真正的满族人，就是一根筋！拿过来满族人一看，不用跟我打岔儿，一根筋就对了！”我照葫芦画瓢，在自己的手腕上看到暴起的两根青筋。老赵随后撸起裤管：“我的腿谁看了都说细。我比你壮多了，粗细跟你差不多，知道为什么吗？祖上骑马骑出来的！”而对满人的习俗，老赵也给了我一个形象的说法：满人干净、理儿特多。这些理有好的，比如和气礼貌尊重老人；也有陋礼，早晨起来刮舌头、漱嗓子、咳嗽之类的。老赵说他的祖上是清朝皇宫里管物资的总管，管理全国给皇宫的供品，管皇帝的赏民。比如赏给南方的黄金白银，可赏蒙古人，就是盐、茶叶、酱油；满人生了孩子，男孩赏一袋小米、十两银子，女孩就赏一袋小米。做过了宫内的主管以后，赵家开始走向没落，清朝以后赵永泉爷爷辈的哥几个都改了姓，各奔东西。“有一个不争气的，就看菜市口那个杀人的虎头铡，真是没落了，没的干了！”老赵的父亲新中国成立后在公安部当油工，还当过劳模，一生知足。老赵追述父亲70多岁时和他闲聊，想起前世族人寿命之短，感慨道：“我活这么大岁数，已然是‘欺祖’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游走在民间、街头寻找北京“原住民”的下落。在这样的经历中，你能感受到北京人的热情、讲理和大度，他们会给你出主意，会在自己的朋友里帮你寻找，最后我与他们也都成了朋友。但对我的目标，就像大海捞针，很难有真正的收获；即便遇见在北京居住很多辈的老北京，对自己家族的历史，他们也很难有一个能经得起考证的说法。

## 什刹海的“老”

但我也没有忘记李子河出的主意。李子河的脱口而出起码说明，许多普通北京人的情结就是什刹海，就好像上海人的城隍庙，苏州人的盘门。从北海后门向北，透过几棵疏散的古树，一汪湖水现了出来，湖水发散着一层薄雾，蒸托着远处高大古朴的钟鼓楼。这就是什刹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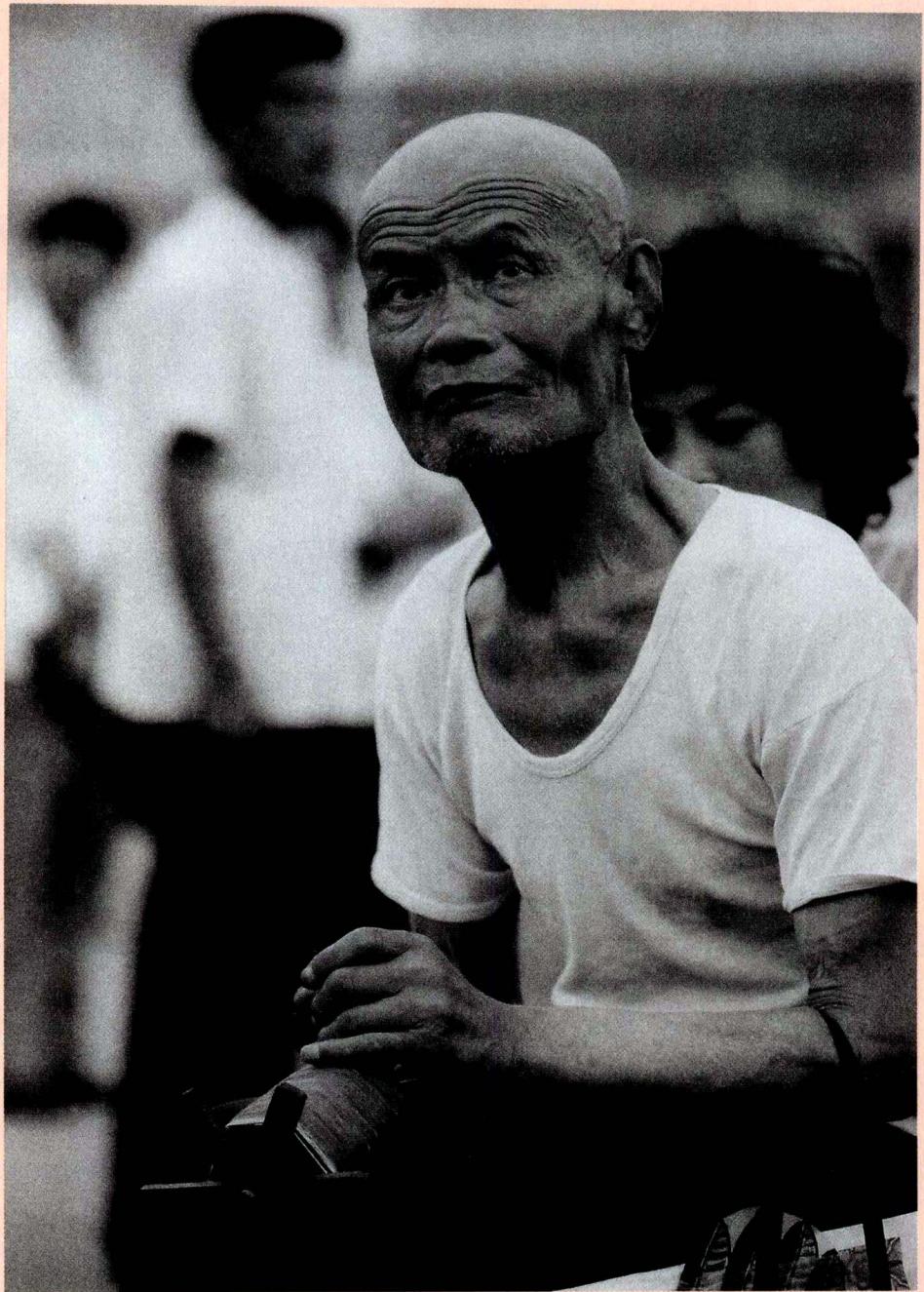
我开始安步当车。顺着湖的左岸，越往里走，身上越感到一阵阵清爽的凉意。周围越来越静，人也渐渐多了起来，更确切地说是老人多了起来，几乎全是老人。有拄着拐杖立在湖边的，有坐在躺椅上在树阴下纳凉的，有三五个人一起聊天打牌的。间或会有几位中年人，也有些谈情说爱或服侍老人的年轻人，但老人占据着这儿的大多半“江山”，我仿佛到了一个老人国，北京的“老”仿佛就老在这里。

走累了，我便歇下来。旁边有位老人，60多岁的年纪，身体已经明显发福了，上身穿着那种老北京的府绸无袖汗衫，下身是宽松的绸灯笼裤，脚上趿拉着一双拖鞋，正坐在一个小马扎上看水。没等我坐稳，他却开了口，问我是不是外地旅游的，一口有些缓慢但不乏清脆的北京腔。我看他面善，又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正好是个聊天寻古的“老北京”。

没等我开口问他的身世，他便告诉我他从小就住在这水边上。“其实呀，”他讲，“当初皇上进京的时候，就看上了这儿的水。元朝盖大都，明代盖北京，街道一直横平竖直，只有什刹海例外。这什刹海只是中间的一段，北边连着后海，南边连着北海、中南海。北海、中南海一直是皇上家的，唯独这什刹海和后海留给了老百姓。所以这儿的人忒多，而且离市场近，热闹。那边那个，”他一指北边的鼓楼，“听老人讲，过去老北京报时，听的就是那儿的晨钟暮鼓。”如今，胡同旅游让这儿火了，蹬三轮的多是山西的。看讲得挺多的，我也感觉熟了一些，就问他：“那您祖上一直住这儿吗？到您这儿第几代了？”“我们祖上先前也不住这儿，我爷爷12岁从河北老家来北京学徒，本来一直住前门边的草厂，那儿都是些手艺人、生意人、劳动人民。在我小时候就跟着大人到这边来住了，一住就60多年。去年我的大小子在北边买了房，把我也接去了。今儿有点闷，就让他开车送我到这儿透透气。这儿房卖了，现如今也不知住上谁了。”

“那您的儿子呢？怎么不陪着您。”

“他们到那边的茶馆去了，那儿热闹。”他指向湖的对面，又放下手，仿佛热闹的只是他们。此时，对岸的什刹海已经变得人声鼎沸、意乱情迷。



实际上，北京是比深圳大得多的移民城市，外来人口的增长位居全国第一。

## 前门的主流商人

什刹海的百姓多跟离市场近确实关系很大。地安门至鼓楼一带的闹市是早年北京的一景；但清军人京后，顺治宣布内城的汉民必须限期搬到外城，北京便又有了新格局。

最初的“前朝后市”不见了，最大的市场从地安门至鼓楼一带挪到了前门外。在从前正方形的城圈里，皇族文化和平民文化混杂在一起。这一回两种文化分流了。汉族的平民百姓移居到南城，借助前门的兴盛迅速发达起来，来自全国各地谋生的小商贩也归流入南城。于是，前门平民文化圈开始滋生和发源，并迅速向着整个南城流淌。而这个文化圈的中心，就在今天前门大街西侧的大栅栏。

现在我去大栅栏的目的通常只有两个：去同仁堂买药或者去张一元买茶。当然，它们也是这条街上最著名的老字号。那么，它们的创始者会是北京“原住民”吗？专家的答复和看到的资料很快就打消了我这个念头。因为同仁堂的肇始之祖乐显扬和张一元的创始人张昌翼，祖籍都不是北京。

乐氏祖籍在浙江宁波慈水镇。几百年前，江浙一带一位穿布鞋披布衣，与村人相处融洽，既治病救人，又闲话家常的老郎中被当地人称为“乐家老郎中”，他就是乐家的祖先。乐氏有很强的宗族意识，宁波乐氏始祖乐人规为了不让乐氏宗族失序，纂修了乐氏宗谱，并以乐汝贞为第一世祖。在宁波居住繁衍了31世以后，明永乐年间，乐家才有人迁往北京。

经过乐氏两代人的艰苦努力，四世乐显扬成为清朝太医院的吏目（掌管御医的高级医官），完成向正统中医药转变的使命，结束了乐氏祖传的铃医生涯。

乐显扬于康熙八年（1669）创办同仁堂药室，他就成为北京同仁堂的肇始之祖。

同仁堂的左邻就是张一元。北京的老字号茶庄有四五十家，但只有在大栅栏的张一元需要排队买茶。它的商标是隶书的“张一元”字体，金色的铺底体现出它的“金般品质，百年承诺”。张

一元的创始人张昌翼 1869 年生于北京，老家是安徽歙县。歙县人在北京从事的行当主要有两个，都是文雅的买卖：茶叶和文房四宝。老北京的茶叶铺很多都是歙县人经营的，正是歙县的老乡介绍张昌翼在茶庄学徒。学足了茶叶的拼配功夫以后，1900 年翅膀长硬的张昌翼在花市开办了第一家店，取名“张玉元”，“玉”有茶的意思，“元”则取第一的含义。1906 年在大栅栏观音寺开设了第二家店，取名“张一元”。“一”和“元”，有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文革”曾经让张一元成为“红旗茶庄”、“大栅栏茶庄”，但 1982 年张一元又恢复了本来面目。老牌匾找不到了，董石良先生重新书写的“张一元”三个字就成为我们今天熟悉的茶叶包装纸上的字体。

可以说，几百年来大栅栏就是在乐显扬、张昌翼们的苦心经营中很快变成前门第一综合大街的，在这里的老北京，同样是在不同的时代从四面八方来到了北京，成长为地道的北京人。

## 琉璃厂的“磁场”

大栅栏象征着旧时北京的商业繁荣，琉璃厂记录的却是老北京骨子里那种特殊的文化气质。琉璃厂穿越年代的优雅会吸引每一个靠近它的人，而对于我，接近琉璃厂，还因为一种究底的愿望。我希望，在北京城市研究文献最集中的中国书店、在这个最有北京味儿的地方找到真正的北京人、找到北京“原住民”的线索。

“我与琉璃厂，那真叫有缘分啊。”上身穿月白色中式短袖衫，面色沉静的马润农先生从前后左右呈包围态势的书堆中抬高他的头，冲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说到了“缘分”：“每天走过这里的人成千上万。不知道别人怎么想，对于我，琉璃厂东西二里地的小街已经构成了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在马润农的讲述中，我能看到近 20 年来风雨无阻，每天都出现在和平门地铁口熙来攘往的人流中的这个北京人。岁月流逝，风华正茂的年轻小伙子马润农变成了一个成熟稳健的中年

人，与阅历成正比的是，他的职位也从中国书店的普通店员升到了中国书店出版社的总编。生活中有些东西总在变化着，而有些东西却永远也不会变，你一直在往前走，但无论何时，只要你一转身，就会发现，有些事情，有些面孔，一直在老地方等你。在马润农的生命中，这个老地方，就是琉璃厂。

向东 500 米，向西 500 米，一条绵延数百年的老街，成了马润农生活中不可分割的常景。

这里在明清时有一个烧制琉璃瓦的窑厂，到了清朝中期就搬家了。窑走了，却没把名字带走。大约 200 年前的清朝乾隆年间，那些在科举中名落孙山的举人们回家之前，会把带来的书籍、墨砚等拿到这条街上卖掉，而他们中还有一些人就永远留在了琉璃厂。

古籍版本学家、书行元老郭纪森祖籍河北，他的说法是：河北人打造了琉璃厂。87 岁的郭纪森老人从 15 岁起便离开家乡，在琉璃厂的古旧书店当学徒，至今他在琉璃厂已经 72 年。郭老认为，造成琉璃厂空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康熙时编撰《古今图书集成》和乾隆时编撰《四库全书》。因为这两部史书的编撰，大批学子纷纷进京，琉璃厂成为他们购书、售书和看书的最佳去处，琉璃厂也因此得到最大限度的繁荣。图书市场的发达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来做图书的分类、装裱、修补等工作，“河北靠近北京，很多河北籍人士从明朝起就在琉璃厂从事图书的修补和装裱，或者经营小本图书生意”。朋友带朋友，同乡带同乡的传承关系使不少河北人来到琉璃厂，日久天长，自己也成为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专家或者成功的书商。到 1956 年前，琉璃厂最大的三家书店，都是由河北人经营的。

对郭老的看法自然会有争论，但毋庸置疑，琉璃厂能成为世界闻名的文化街是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结果，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士人奠定了琉璃厂的文化气质。马润农从小就随他的父母在这七八百年的历史中穿行，真切地体会着那段历史、那种气质。

马润农的母亲是河北人，父亲是河南人。这两位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在鼓楼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养育了马润农。除了逛厂甸庙会，玩风筝吃糖葫芦的乐趣外，他们一家总会不定期地前往琉璃厂淘书，琉璃厂的“磁场”对马润农来说就像是某种召唤。

“如果说有哪一个城市，由于深厚的历史原因，本身即拥有一种‘精神品质’，能施加无形然而重大的影响于居住、一度居住以至过往的人们的，这就是北京。”赵园先生在《北京：城与人》开篇这样讲。马润农也在这样的精神品质中熏陶成了地道的北京人。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2003年的数据，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为286.9万人。若干年后，他们中不知会有多少人将成为真正的北京人。

## 新派北京人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深明大义的傅作义将军将一座完好的北京城交给了人民解放军，北京人虽然经历过无数历史变迁，但还是感到腰杆儿硬了许多。

叶挺将军的后代也在这个历史阶段来到了北京。这代表着新中国建立以来到北京的一大批主流北京人。将军的孙子叶大鹰在他拍摄的《红樱桃》、《红色恋人》里表现着一种对红色的偏爱和执著。或许因为叶挺将军的缘故，有人把他归为“红色贵族”，

他告诉我不喜欢这个称谓，因为他不是贵族更不红色……但必须承认，父辈给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成长为北京人的经历：“部队大院儿孩子突出的地方，是在我们的作品里体现出的所谓‘暴力美学’，就是说用审美的方式看待暴力。因为从小崇尚英雄，打小就在军事化、集体化的生活下成长起来，军人对于我们是一种精神寄托，是一种很难用言语表达的特殊情感。”

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叶大鹰的成长经历了新中国每一个不正常的历史阶段，这让大院儿里的孩子更加与众不同，他们还无法体会到政治苦难的严重：“童年生活印象特别深的就是——特别忙，从早到晚的忙。”每天早上四五点钟，爬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去钓鱼，六点钟左右提着战利品回家，领着妹妹到食堂打饭，再给被隔离的父亲送饭。然后背着书包出门，其实根本就不到学校去。叶大鹰在老乡家里养了一只狗，他的任务就是喂狗，再玩儿一圈。到中午快放学的时候，继续打饭送饭。下午更加快乐，游泳、钓鱼、偷西瓜、偷白薯……晚上六点半一到，大喇叭播放的全国新闻联播是全院儿打弹弓仗的小孩儿们集合的号令，他们的子弹是用白天撕的大字报做成的。等到回家，昏头昏脑，已经基本上睡着了。

等到理解了政治运动的意义以后，叶大鹰开始更多地感受北京，感受北京人。1969年随父亲下放到上海，1984年回到北京，十几年的磨砺让叶大鹰更多地体会到了北京的独特。“北京是我最亲近的地方，我最愿意待的地方。”用北京人的幽默感“调侃”自己对情感的一种理解、表述心情状态也成了叶大鹰在人们面前的一种常态。叶大鹰很勤奋，但他对自己工作的描述却是：“北京人工作的态度和别人也不太一样，也用功但看起来总像是一玩票的。反正我就是这样，这就是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因此，想要见叶大鹰，可以去酒吧。他和王朔、姜文三个人一起开的酒吧叫“非画廊”，取谐音“废话廊”，这儿就是他们和朋友聚在一起说废话的地方。

而在大院儿以外，新中国给北京人带来了另外一种优越感。中国从1958年起实行的户籍制实质上是一种城乡隔离制度，这